

《洛阳伽蓝记》的文献价值及其文学意韵^{〔*〕}

刘跃进^{1,2}

(1. 河南大学 文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2. 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 100732)

〔摘要〕要了解《洛阳伽蓝记》的文献价值,首先要知道《洛阳伽蓝记》作者的仕历情况、该书的体例、内容以及北魏佛教文化的历史背景,这是本文着重讨论的问题。《洛阳伽蓝记》的文学意蕴则是文本的重点。在这部分论述中,涉及一些文学史实、文字描写以及文学作品中透露出来的南北偏见。这些内容,可与《世说新语》《颜氏家训》等文献相关印证,展示了《洛阳伽蓝记》的独特价值。

〔关键词〕《洛阳伽蓝记》;佛教寺庙;文学描写;北魏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3.09.002

一、《洛阳伽蓝记》的作者及其仕历

《洛阳伽蓝记》的作者,《广弘明集》卷六、《新唐书·艺文志》、《河南志》作“阳衡之”。《史通·补注》《郡斋读书志》《百川书志》作“羊衡之”。《隋书·经籍志》、《历代三宝记》卷九、《续高僧传》卷一《菩提流支传》、《法苑珠林》卷一百《传记篇·杂集部》作“杨衡之”。羊氏为泰山著姓,望非北平。据此,《四库全书总目》认为“羊”

字疑误。至于杨姓,非北平望姓。不过,现在通行的《洛阳伽蓝记》卷首下题署“魏抚军府司马杨衡之撰”。范祥雍先生《杨衡之传略》力主杨姓。^{〔1〕}周延年《杨衡之事实考》则认为杨姓不可靠,当姓“阳”。其文曰:“详考《北史》及《魏书》,杨氏达者无北平籍,而《魏书·阳固传》:固字敬安,北平无终人,有三子,长休之,次诠,三未详。《北史》固传称有五子。长子休之传云:弟琳之,次俊之,与衡之名字排行颇为相近。休之且长文

作者简介:刘跃进,《学术界》本期封面人物,文学博士,现任河南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哲学部副主任,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华文学史料学会会长,中国现代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中国文学卷副主编及先秦卷、秦汉卷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成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等。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兼任《文学遗产》《文学评论》《中国文学年鉴》主编等职。著有《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秦汉文学编年史》《门阀士族与文学总集》《中古文学文献学》《〈金瓶梅〉中商人形象透视》《雄风振采——汉代文学通览》等。学术论文集有《古典文学文献学丛稿》《秦汉文学论丛》《走向通融——世纪之交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回归中的超越——文学史研究的多种可能性》《〈文选〉学丛稿》《文学史的张力》等。学术序跋随笔讲演集有《潮平两岸阔》《跋予望之》《开窗放入大江来》,散文集有《从师记》等。

〔*〕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资助项目“汉魏六朝集部文献集成”(13&ZD109)的阶段性成果。

学,为史官,有声当时,则北平之阳氏以文章传家,已可概见。衡之若果为阳姓,其为休之弟或族昆弟,必无疑矣。”^[2]徐高阮《重刊洛阳伽蓝记》校勘记:“阳固以后魏正光四年卒,时年五十七岁。衡之于永安二年已为奉朝请,时去固卒九年。至武定五年,已经大乱。衡之因行役重览洛阳,乃作此记,时去固卒二十余年,则以年论之,谓固与衡之为父子辈,似亦可相当。固历仕太祖、世宗、肃宗朝,以刚直雅正称,曾著南北二都赋,以讽贵戚奢靡之事。而特受知于清河王怱。观衡之此记,识既广博,言多讽谕,于诸王豪侈,颇详书之,唯于清河,称其名行,云有固风,似不为过。若断父子,尚恐未足。”“冲觉寺”“融觉寺”皆清河王元怱所立。“冲觉寺”条对元怱给予正面的评价:“怱,亲王之中,最有名行,世宗爱之,特隆诸弟。”“延昌四年世宗崩,怱与高阳王雍、广平王怀并受遗诏,辅翼孝明。时帝始年六岁,太后代总万机,以怱明德茂亲,体道居正,事无大小,多咨询之。……”

为便于行文,这里姑且统一从俗作杨衡之。杨衡之原籍北平(今河北定县,一说河北遵化),^[3]生卒年不详。《洛阳伽蓝记》卷一:“永安中庄帝马射于华林园,衡之时为奉朝请。”据此而知,杨衡之于北魏永安(528—530)年间为奉朝请,参与魏孝庄帝在华林园举行的马射,当时孝庄帝见到三国时魏明帝的“苗茨之碑”,因问“苗茨”二字的解释,杨衡之答称:“苗”乃“茅”之假借,是“以蒿覆之”的意思,得到众人称赞。奉朝请在元魏时为从第七品,官阶甚低,一般是起家官,多在二十岁左右担任,可上推杨衡之生年在公元510年左右。从自序载其“至武定五年,岁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览洛阳”等语以及书中所记史事,可知书中记事最晚为魏孝静帝武定五年(547)。严可均推测其“齐天保中卒于官”,未详所据,然亦距事实不远,年过五十。^[4]

杨衡之的仕宦经历可推测者有四:一是奉朝请。前文已指出是其二十岁左右。二是期城太守。《历代三宝记》卷九说“《洛阳伽蓝记》五卷,

期城郡太守杨衡之撰”。《续高僧传》卷一、《法苑珠林》卷一百、《大唐内典录》卷四都说到他曾为“期城郡守”。史载,期城在元象元年(538)已为西魏攻克,不再属于东魏。因此,杨衡之为期城太守,当在西魏攻克之前,大约三十岁。三是抚军府司马。今各本《洛阳伽蓝记》则题“魏抚军府司马杨衡之”。据此知道,杨著书时为抚军府司马,可能是他晚年著书时所居官职。四是秘书监。《广弘明集》卷六《叙历代王臣滞惑解》记载“杨衡之,北平人,元魏末为秘书监”。^[5]据《魏书·官氏志》,抚军将军属从第二品,从第二品将军司马属第五品,秘书监属第三品。外任秘书监则已是东魏亡国的前夕。北齐代东魏在公元550年,与杨衡之行役洛阳仅相去三年,如果署衡和《广弘明集》的记载均不误,就可以推知此书大约成于公元547年之后。

二、《洛阳伽蓝记》的体例及其内容

《洛阳伽蓝记》自序:“先以城内为始,次及城外,表列门名,以记远近。凡为五篇。”后来著录,皆为五卷。这五卷是: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每卷以著名的佛寺为纲,兼及有关的宫殿、邸宅、园林、佛塔、塑像以及有关人物的轶事掌故,甚至还有类似的志怪传说等。

刘知几《史通·补注》:“亦有躬为史臣,手自刊补,虽志存赅博,而才阙伦叙。除烦则意有所吝;毕载则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为子注。若萧大圆《淮海乱杂志》、羊衡之《洛阳伽蓝记》、宋孝王《关东风俗传》、王邵《齐志》之类是也。”《洛阳伽蓝记》卷五“凝玄寺”条:“凝玄寺,阍官济州刺史贾璨所立也。在广莫门外一里御道东,所谓永平里也。注:即汉太上王广处。”(“广”字,徐高阮和周祖谟都认为是“庙”字之误)这是全书唯一保留的一个“注”字,似乎说明,杨衡之著书时确实自为子注。

现存《洛阳伽蓝记》最早的版本是明代嘉靖年间的如隐堂刻本,《四部丛刊》据以影印。这个如隐堂本,子注与本文混在一起,并无区分。

清代道光年间,吴瑄《古今逸史》本据刘知几《史通》所说,遂试将区分正文和注文,但不尽如人意。清人顾千里《洛阳伽蓝记跋》云:

予尝读《史通·补注》,知此书原用大小字分别书之。今一概连写,是混注入正文也。意欲如全谢山治《水经注》之例,改定一本。惜牵率乏暇,汗青无日。爰标识于最后,世之通才,倘依此例求之,于读是书,思过半也矣。

根据顾千里的意见,吴若准《〈洛阳伽蓝记〉集证》参考了《水经注》的类型,亦对正文子注试行分析,正文仅仅略述纲目,凡铺叙之文,概列为注。^[6]这样,注文多出正文数倍。诚如陈寅恪所说,“吴本正文太简,子注过繁,其所分析与杨书旧观相去甚远。”唐晏《洛阳伽蓝记钩沉》在肯定吴本的同时,对于正文多所增益,以纠吴本之失。不过,唐晏的校订本并无版本依据,多主观臆测,不无舛误。

张宗祥《〈洛阳伽蓝记〉合校》则不主一本,采取折中的方法。自序称:“此本既不敢据一本认为定本,亦不敢据他书妄改本书,今合校诸书,择其长者,倘有异义,下注某刊作某,存而不论,但使学者不愿妄断,故名之曰合校本。”该书最初由商务印书馆1930年石印出版。书后附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各本序跋录及吴若准《〈洛阳伽蓝记〉集证》和张宗祥的校补。1997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将此本与唐晏《洛阳伽蓝记钩沉》五卷合为一书,影印出版。

陈寅恪先生力主六朝人“合本子注之书”的体例来自佛典,即以《洛阳伽蓝记》为证。他在《读〈洛阳伽蓝记〉书后》中说:

鄙意衡之习染佛法,其书制裁乃摹拟魏晋南北朝僧徒合本子注之体,刘子玄盖特指其书第五卷惠生、宋云、道荣等西行求法一节以立说举例,后代章句儒生虽精世典,而罕读佛书,不知南北朝僧徒著作之中实有此体,故于《洛阳伽蓝记》一书之制裁义例懵然未解,固无足异。

中古时期涉及佛教的著作,陈寅恪先生提出有

“合本子注”的现象,也就是说,这些著作,正文与注文分开。如支敏度《合维摩诘经序》“以明所出为本,以兰所出为子”。竺昙无兰《大比丘二百六十戒三部合异序》:“以二百六十戒为本,二百五十者为子。”这种“合本子注之体”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呢?徐高阮《洛阳伽蓝记补注体例辨》认为,“盖佛经译本往往重出,遂有合数译为译本者,以一译为母,他译为子,凡有异同之处,以子注母,夹行细书,藉资参证,是为合本子注。魏晋已降史家作注,略同此意,而于参证异同之外,尤以增述事绪为重,此则又与佛徒合本有其区别,是以寅恪先生又谓之为‘广义之合本子注’。”这种注释体例,类似于刘孝标《世说新语注》等,正文之下,双行小注。中国古书注释还有一种排列形式,正文顶格,注则另起,均低两格。当然,也存在有的注释,正文与注释分别行世,如《史记》三家注那样,后人又合在一起。《韩非子·内外储》、扬雄《太玄》,正文中皆含有注文,类似这样的情形当不是个案。《韩非子》的时代,佛教尚未进入中土,这种著述体例,追源溯流,是否皆源于佛教徒“合本子注之体”?显然还值得探讨。具体到《洛阳伽蓝记》,是适合该书第五卷引述惠生、宋云、道荣的行记章节,还是整体都是正文、子注分开,仍未取得一致意见。^[7]但是,阅读《洛阳伽蓝记》,确实有作者或者他者引申注释说明的现象。徐高阮、周祖谟、杨勇诸先生试图区别正文与注释,作了很多努力,多有创获,当时各家标准不一,自然存在着若干值得商榷的地方。

徐高阮《重刊洛阳伽蓝记》,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60年在台北出版,中华书局2013年据此本影印。该书分段亦依如隐堂本,凡是认为自注者,则双行小字附在本句之下。书前作者自序及陈寅恪序。书后附《洛阳伽蓝记》校勘记及人名、地名、佛典索引。陈寅恪《重刊洛阳伽蓝记序》重申了自己的见解:“裴氏《三国志注》实一广义之合本子注也。刘孝标《世说新语注》经后人删略,非复原本。幸日本

犹存残卷,得藉以窥见刘注之旧,知其书亦广义之合本子注也。酈善长之注《水经》,其体制盖同裴、刘。而此书传世,久无善本。虽清儒校勘至勤,蔚成显学,惜合本子注之义迄未阐发。然则徐君是本之出,不独能恢复杨记之旧,兼可推明古人治学之方法。”书后附陈寅恪《读〈洛阳伽蓝记〉书后》及作者《〈洛阳伽蓝记〉补注体例辨》,比较《集证》本、《钩沉》本的异同,阐明《重刊》本厘定原则。

周祖谟先生《〈洛阳伽蓝记〉校释》、范祥雍先生《〈洛阳伽蓝记〉校注》、杨勇《洛阳伽蓝记校笺》三部著名的注释,并以如隐堂本为底本。

周著以《永乐大典》所引本及《大正藏》所收校本,其特点在文字训释,简明扼要。其体例上,认为是注释的文字,则低二格,大体参考了《集证》《钩沉》等成果。书后附有《年表》《引用书目》《人名索引》及作者《漫谈校注〈洛阳伽蓝记〉的经过》《北魏的佛教与政治》《周祖谟自传》等。科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中华书局1963年再版,上海书店2000年重版,中华书局2010年三版。

范著除解释文字外,尤注重于北魏政治、宗教、社会史实的补充考订,又附录有佚文、杨銜之传略、历代著录、序跋题识、绘图与图说及年表等,内容颇为丰富,同时也失之繁缛。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再版。

杨著晚出,充分吸收上述著作之优长,重点在区分正文与注语,认为《洛阳伽蓝记》以地志为经,举凡寺庙之由来、坊里所在及人物名胜建制等,为正文;以史事为纬,举凡寺庙之考订、坊里人物的文献资料为注文,涉及人物言行、诡异幻梦的传说等,亦附载于注文中。书后所附《洛阳伽蓝记之旨趣与体例》具体论述上述观点。亦附有年表及《北魏洛阳伽蓝图》《宋云使西域行程图》,台北正文书局1982年版,中华书局2006年修订再版。

除上述各本细心考订正文注文外,《洛阳伽蓝记》在体例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作者用“銜之曰”引起,发表一些议论,类似于《左传》之“君子曰”。

《洛阳伽蓝记》的主要内容是叙述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迁都洛阳后到分裂为东西魏的永熙三年(534)的四十年间佛教的兴衰,并以此为线索,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北魏时期洛阳工商业的发达以及贵族的豪奢生活等,举凡诸王及太后的内争、皇室王侯的奢侈、社会风化的迷乱、寺庙内部的淫秽、夷夏之辨的发挥,以及文人学者的妄言,或直接描绘,或讖语隐喻。不仅如此,该书还记载了南海的风貌、西域的人情。如卷四“白马寺”记载佛教由西域进入中土,专门记述了石榴、葡萄的种植和美味:

浮屠前茶林蒲萄异于余处,枝叶繁衍,子实甚大。茶林实重七斤,蒲萄实伟于枣,味并殊美,冠于中京。帝至熟时,常诣取之。或复赐宫人,宫人得之,转饷亲戚,以为奇味。得者不敢辄食,乃历数家。京师语曰:“白马甜榴,一实直牛。”

茶林,又作涂林,译名。《齐民要术》卷四:“陆机曰:张骞为汉使外国十八年,得涂林。涂林,安石榴也。”“《邺中记》云:石虎苑中有安石榴,子大如孟碗,其味不酸。”魏晋时期的作品多有吟咏。而卷五引用惠生、宋云、道荣的西方求法的行记,更是中外交流史的重要资料,为学术界所关注。

洛阳城有大市、有小市。卷四记载洛阳大市:

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有刘宝者,最为富室。州郡都会之处皆立一宅,各养马十匹。至于盐粟贵贱,市价高下,所在一例。舟车所通,足迹所履,莫不商贩焉。是以海内之货,咸萃其庭,产匹铜山,家藏金穴。宅宇逾制,楼观出云,车马服饰拟于王者。

市南有调音、乐律二里。里内之人,丝竹讴歌,天下妙伎出焉。有田僧超者,善吹笛,能为《壮士歌》、《项羽吟》,征西将军崔延伯甚爱之。正光末,高平失据,虎吏充斥,贼帅万俟丑奴寇暴泾岐之间,朝廷为旰食,诏延伯总步骑五万讨之。延伯出师于洛阳城西张方桥,即汉之夕阳亭也。时公卿祖道,车骑成

列，延伯危冠长剑耀武于前，僧超吹壮士笛曲于后，闻之者懦夫成勇，剑客思奋。延伯胆略不群，威名早著，为国展力，二十余年，攻无全城，战无横陈，是以朝廷倾心送之。延伯每临阵，常令僧超为壮士声，甲冑之士莫不踊跃。延伯单马入阵，旁若无人，勇冠三军，威镇戎竖。二年之间，献捷相继。丑奴募善射者射僧超亡，延伯悲惜哀恻，左右谓伯牙之失钟子期不能过也。后延伯为流矢所中，卒于军中。于是五万之师，一时溃散。

市西有延酤、治觞二里。里内之人多酤酒为业。河东人刘白堕善能酿酒。季夏六月，时暑赫晷，以罌贮酒，暴于日中，经一旬，其酒味不动。饮之香美，醉而经月不醒。京师朝贵多出郡登藩，远相餽饷，逾于千里。以其远至，号曰鹤觞，亦名骑驴酒。永熙年中南青州刺史毛鸿宾贳酒之藩，路逢贼盗，饮之即醉，皆被擒获，因此复命“擒奸酒”。游侠语曰：不畏张弓拔刀，唯畏白堕春醪。

市北有慈孝、奉终二里，里内之人以卖棺槨为业，赁輶车为事。有挽歌孙岩，娶妻三年，妻不脱衣而卧。岩因怪之，伺其睡，阴解其衣，有毛长三尺，似野狐尾，岩惧而出之。妻临去，将刀截岩发而走，邻人逐之，变成一狐，追之不得。其后京邑被截发者，一百三十余人。初变为妇人，衣服靓妆，行于道路，人见而悦近之，皆被截发。当时有妇人着彩衣者，人皆指为狐魅。熙平二年四月有此，至秋乃止。

我们读《木兰辞》：“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鞞，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虽不能确认是哪座城市，但当时的商业分布，都有一定的同类聚集的特点。

市东为有通商、达货二里，显然是商业中心，“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其中刘宝最为首富。卷二“景宁寺”条记载屠夫：“孝义里东市北殖货里。里有太常民刘胡兄弟四人，以屠为业。永安年中，胡杀猪，猪忽唱乞命，声及四邻。

邻人谓胡兄弟相殴斗而来观之，乃猪也。胡即舍宅为归觉寺，合家人入道焉。普泰元年，此寺金像生毛，眉发悉皆具足。尚书左丞魏季景谓人曰：‘张天锡有此事，其国遂灭，此亦不祥之征。’至明年而广陵被废死。”

市南为调音、乐律二里，顾名思义，就是娱乐的场所。田僧超为吹笛名家，能为《壮士歌》《项羽吟》。征西将军崔延伯带他去前线，“延伯危冠长剑耀武于前，僧超吹壮士笛曲于后，闻之者懦夫成勇，剑客思奋”。可见其音乐的魅力和动力。

市西则为延酤、治觞二里，多以贩酒为业。河东人刘白堕善能酿酒。盗窃者偷喝酒最不能起，又称“擒奸酒”。游侠语曰：“不畏张弓拔刀，唯畏白堕春醪。”

市北则为慈孝、奉终二里，是出售棺槨的地方。相传有挽歌郎孙岩妻竟然是狐媚所变。

当然，最富有的地方在城西，那时皇宗居住的地方，民间号为王子坊。《洛阳伽蓝记》卷四“法云寺”条记载，昭仪尼寺在东阳门内，是晋侍中石崇家池，池南有绿珠楼，经过者，想见绿珠之容。卷四“法云寺”条记载：

当时四海晏清，八荒率职，缥囊纪庆，玉烛调辰，百姓殷阜，年登俗乐。鰥寡不闻犬豕之食，茕独不见牛马之衣。于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崇门丰室，洞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芳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而河间王琛最为豪首。常与高阳争衡，造文柏堂，形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五色绩为绳。妓女三百人，尽皆国色。有婢朝云，善吹篪，能为团扇歌、陇上声。琛为秦州刺史，诸羌外叛，屡讨之不降。琛令朝云假为贫姬，吹篪而乞。诸羌闻之，悉皆流涕。迭相谓曰：“何为弃坟井，在山谷为寇也？”即相率归降。秦民语曰：“快马健儿，不如老姬吹篪。”琛在秦州，多无政绩，遣使向西域求名马，远至波斯国。得千里马，号曰追风赤骥。次有七百里

者十余匹,皆有名字。以银为槽,金为环锁,诸王服其豪富。琛常语人云:“晋室石崇,乃是庶姓,犹能雉头狐腋,画卵雕薪,况我大魏天王,不为华侈。”造迎风馆于后园,窗户之上,列钱青琐,玉凤衔铃,金龙吐佩。素柰朱李,枝条入檐,伎女楼上,坐而摘食。琛常会宗室,陈诸宝器。金瓶银瓮百余口,瓿菜盘盒称是。自余酒器,有水晶钵、玛瑙琉璃碗、赤玉卮、数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又陈女乐及诸名马。复引诸王按行府库,锦罽珠玑,冰罗雾縠,充积其内,绣纈、紬绫、丝彩、越葛、钱绢等,不可数计。琛忽谓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融立性贪暴,志欲无限,见之叹惋,不觉生疾,还家卧三日不起。江阳王继来省疾,谓曰:“卿之财产,应得抗衡,何为叹美,以至于此?”融曰:“常谓高阳一人,宝货多于融,谁知河间,瞻之在前。”继笑曰:“卿欲作袁术之在淮南,不知世间复有刘备也?”融乃蹶起,置酒作乐。

于时国家殷富,库藏盈溢,钱绢露积于廊者,不可校数。及太后赐百官负绢,任意自取,朝臣莫不称力而去。唯融与陈留侯李崇负绢过任,蹶倒伤踝。侍中崔光止取两匹,太后问曰:“侍中何少?”对曰:“臣有两手,唯堪两匹,所获多矣。”朝贵服其清廉。

像这样王公贵族的豪宅,所在多有。如卷四写到元怱的住宅,“第宅丰大,逾于高阳。西北有楼,出凌云台,俯临朝市,目极京师,古诗所谓‘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者也。楼下有儒林馆、延宾堂,形制并如清暑殿。土山钓池,冠于当世。斜峰入牖,曲沼环堂,树响飞嚶,阶丛花药。怱爱宾客,重文藻,海内才子,莫不辐辏,府僚臣佐,并选隽民。至于清晨明景,骋望南台,珍羞具设,琴笙并奏,芳醴盈壘,嘉宾满席。使梁王愧兔园之游,陈思惭雀台之宴。”

卷四形容元彧的住宅:“彧性爱林泉,又重宾客。至于春风扇扬,花树如锦,晨食南馆,夜游后

园,僚案成群,俊民满席。丝桐发响,羽觞流行,诗赋并陈,清言乍起,莫不领其玄奥,忘其褊吝焉。是以入或室者,谓登仙也。荆州秀才张斐常为五言,有清拔之句云:‘异林花共色,别树鸟同声。’彧以蛟龙锦赐之。亦有得绀紫绫者。唯河东裴子明为诗不工,罚酒一石。子明饮八斗而醉眠,时人譬之山涛。”“河阴之乱”后,皇室成员多为歼尽,王侯第宅,多题为寺。这也是洛阳寺庙之多的原因之一。

杨衒之悲魏之乱亡而作此书,于“河阴”以前洛阳盛况,恐不无溢美,盖自宣武帝以来,饥馑相臻,民多饿死,何能“不闻犬豕之食”“不见牛马之衣”。然洛阳贵族崇尚佛教之豪奢,当是事实。这也是杨衒之撰写《洛阳伽蓝记》的缘起。

三、《洛阳伽蓝记》中的北魏佛教文化

《洛阳伽蓝记》序言说:“至武定五年,岁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牧豎,踟躅于九逵;农夫耕老,艺黍于双阙。始知《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就在同一年,东魏荀济被杀,他撰有《论佛教表》,两个人的思想倾向基本一致,都对当时佞佛的风气表示质疑。荀济原本生活在江南,对于梁武帝佞佛颇有不满,认为其“营费太甚”,梁武帝怒,欲杀之,荀济逃到东魏,结果还是被杀。当然,荀济在东魏之死,与其辟佛无关。当时他的《广弘明集》七《论佛教表》有二不取,五不经,十等罪,结论是“今释氏君不君,乃至子不子,纲纪紊乱矣”,确实非常深刻。从内容看,文章作于江南,当时他的死,以及他的著作,杨衒之应当有所耳闻。《洛阳伽蓝记》卷二:“颍川荀济,风流名士,高鉴妙识,独出当世。”从基本倾向上说,他应当赞同荀济的观点,对于北魏以来逐渐佞佛之风颇有不满。《广弘明集》六《上东魏主启》所持观点与荀济相近,认为佛教“虚诞,有为徒费”:

释教虚诞,有为徒费,无执戈以卫国,有

饥寒于色养,逃役之流,仆隶之类,避苦就乐,非修道者,又佛言有为虚妄,皆是妄想,道人深知佛理,故违虚其罪。读佛经者,尊同帝王,写佛画师,全无恭敬,请沙门等同孔老拜俗,班之国史,行多浮险者,乞立严勒,知其真伪。然后佛法可遵,师徒无滥,则逃兵之徒,还归本役,国富兵多,天下幸甚。

刘昼也持相近观点,不过更为激进。《广弘明集》卷六将杨衒之和刘昼都列入《历代王臣滯惑解》。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另有专文论述。此处不赘。

杨衒之的思想较为复杂,他信奉儒家思想,对道家思想也有钟爱。《洛阳伽蓝记》就记载了佛教之外的很多历史学术。如卷一“永宁寺”条:“其寺东有太尉府,西对永康里,南界昭玄曹,北邻御史台。闾阖门前御道东有左卫府。府南有司徒府。司徒府南有国子学,堂内有孔丘像。颜渊问仁、子路问政在侧。国子学南有宗正寺,寺南有太庙,庙南有护军府,府南有衣冠里。”在北方,儒家思想依然是一种被尊敬的思想。卷一“景林寺”条记载卢裕撰写石铭事迹:

白头,一字景裕,范阳人也。性爱恬静,丘园放教。学极六经,说通百氏。

普泰初,起家为国子博士。虽在朱门,以注述为事,注周易行之于世也。

卷五记载宋云出行之乌场国,“国王见宋云大魏使来,膜拜受诏书。闻太后崇奉佛法,即面东合掌,遥心顶礼。遣解魏语人问宋云曰:‘卿是日出人也?’宋云答曰:‘我国东界有大海水,日出其中,实如来旨。’王又问曰:‘彼国出圣人否?’宋云具说周孔庄老之德;次序蓬莱山上银阙金堂,神仙圣人并在其上;说管辂善卜,华佗治病,左慈方术;如此之事,分别说之。王曰:‘若如卿言,即是佛国,我当命终,愿生彼国。’”显然,在宋云的介绍中,他是极力推崇老子、庄子的思想,管辂的占卜、华佗的医术以及左慈的方术等,叫乌场国王心向往之。

《洛阳伽蓝记》中,作者引用了若干志怪故

事,似乎是想说明佛教之不污,如卷一“崇真寺”条记载比丘慧嶷,死经七日还活,经阎罗王检阅,以错召放免的故事,说明“自此以后,京邑比丘皆事禅诵,不复以讲经为意”。又譬如“平等寺”条记载所谓“佛汗”:

孝昌三年十二月中,此像面有悲容,两目垂泪,遍体皆湿,时人号曰佛汗。京师士女空市里往而观之。有一比丘,以净绵拭其泪,须臾之间,绵湿都尽。更换以它绵,俄然复湿。如此三日乃止。明年四月尔朱荣入洛阳,诛戮百官,死亡涂地。永安二年三月,此像复汗,京邑士庶复往观之。五月,北海王入洛,庄帝北巡。七月,北海王大败,所将江淮子弟五千,尽被俘虏,无一得还。永安三年七月,此像悲泣如初。每经神验,朝野惶惧,禁人不听观之。

佛像“出汗”,本来是一种物理现象,而作者却与政治变故挂钩,显然带有神异色彩,本意是辟佛,这里又在宣扬佛教之不污。

《洛阳伽蓝记》卷三“菩提寺”记载,崔涵死后复生,自述柏木为棺,可以长生,“京师闻此,柏木踊贵”。显然,这是商人编造的故事,推销柏木棺槨的把戏。作者也认为不可靠,只是说,“人疑卖棺者货涵发此之言也”。但有的时候,杨衒之对于一些玄虚的东西又表示一定程度的欣赏态度。如《洛阳伽蓝记》卷一“昭仪尼寺”记载的树神:

池西南有愿会寺,中书侍郎王翊舍宅所立也。佛堂前生桑树一株,直上五尺,枝条横绕,柯叶傍布,形如羽盖。复高五尺,又然。凡为五重,每重叶椹各异。京师道俗谓之神桑。观者成市,布施者甚众。帝闻而恶之,以为惑众。命给事黄门侍郎元纪伐杀之。其日云雾晦冥,下斧之处,血流至地,见者莫不悲泣。

东汉应劭《风俗通》中记载了很多类型的神,说明中国古代是一个泛神论的国家,有山神、水神还有树神,没有一个统一供奉的神灵。孔子就不语怪力乱神。因此,不能说杨衒之完全辟佛,他对于佛教有着又爱又恨的情绪。毕竟,他生活在

一个佛教文化高度发达的时代，他的思想不可能不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

佛教文化进入北魏，乃至延续到东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

《魏书·释老志》：“魏先建国于玄朔，风俗淳一，无为以自守，与西域殊绝，莫能往来。故浮图之教，未之得闻，或闻而未信也。”魏晋以后，佛教进入中土已有两百年的历史，其影响范围终究有限。《洛阳伽蓝记》序言称：“至于晋室永嘉，唯有寺四十二所。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愈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讲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锦绣，土被朱紫而已哉！”十六国时期，佛教在北方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河西、三秦地区，都是佛教发展的重镇。法显出使西域，鸠摩罗什、僧朗等人翻译佛经等，都反映了这个时期佛教文化的兴盛。

公元386年正月，鲜卑拓跋氏共立拓跋珪为国主，拓跋珪即代王位，在牛川（呼和浩特市东南）大会诸侯，即代王位，郊天，改元登国元年。四月，改称魏王，西向设祭，告天成礼，再次定都盛乐。在沿袭汉晋三省制基础上，设立八部大夫和八部帅，鼓励农耕，胡汉杂居，倡导儒学开设太学。北魏逐渐再度兴盛。北魏拓跋珪改元皇始元年七月（396），参军事上谷张恂劝珪进取中原，从之。八月，大举伐后燕，获广宁、上谷。九月，取并州，初建台省，置刺史、太守、尚书郎以下官，悉用儒生为之。十一月，拓跋珪包围燕中山，河北诸郡皆纳款。自此至孝文帝迁都洛阳，政治经济中心南移，近百年之中，北魏统治者对于山东冀、定、相三州特别重视。

皇始三年（398）正月，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克后燕邺城，中原大片土地成为北魏疆域。六月，北魏道武帝拓跋珪议国号，群臣以为当称代，崔宏作《国号议》，以为当称魏，拓跋珪从之，作《定国号为魏诏》。为便于管理和进一步进军中原，七月，迁都平城，作《即位告祭天地祝文》，建宗

庙、社稷。并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二千家于代都。十一月，立官制，协音律，定律令。十二月，拓跋珪称皇帝，改元天兴，作《即位告祭天地祝文》。命朝野皆束发加帽，乐用《皇始之舞》。但是主要还是以崔浩为师，置五经博士，增国子学生员三千人。

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天兴元年，下诏曰：‘夫佛法之兴，其来远矣。济益之功，冥及存没，神踪遗轨，信可依凭。其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岁，始作五级佛图、耆闾崛山及须弥山殿，加以缋饰。别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莫不严具焉。太宗践位，遵太祖之业，亦好黄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民俗”。北魏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时期，道教获得发展，寇谦之得到重用：“虽归宗佛法，敬重沙门，而未存览经教，深求缘报之意。及得寇谦之道，帝以清净无为，有仙化之证，遂信行其术。时司徒崔浩，博学多闻，帝每访以大事。浩奉谦之道，尤不信佛，与帝言，数加非毁，常谓虚诞，为世费害。帝以其辩博，颇信之。”此后，佛教虽有恢复，当时仍然受到很多限制。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延四年（438），下令罢沙门年五十以下者俾从征役。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三月，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用崔浩言，下《灭佛法诏》，命诸州坑沙门，毁诸佛系，徙长安城工巧二千家于平城。崔浩力主灭佛之义。及伐盖吴，从官自佛寺僧房中藏有兵刃，遂下令禁佛。太子晃素好佛，谏，不听。寇谦之深察情势，知太子晃辈甚不欲，虽信道教，亦不力主灭佛。故力劝崔浩弗为。甚至说：“卿今促年受戮，灭门户矣！”

拓跋焘被杀后，北魏文成帝拓跋濬初复佛法，作《修复佛法诏》，为僧师贤等五人剃度。“今制诸州郡县，于众居之所，各听建佛图一区，任其财用，不制会限。其好乐道法，欲为沙门，不问长幼，出于良家，性行素笃，无诸嫌秽，乡里所明者，听其出家。率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其郡遥远台者十人。各当局分，皆足以化恶就善，播

扬道教也。天下承风，朝不及夕，往时所毁图寺，仍还修矣。佛像经论，皆复得显。”由北凉入魏的昙曜所建大同云冈石窟，即始于北魏文成帝初年。北魏建国后，太武帝(442)、文成帝(454)和献文帝(466)等三位皇帝至道坛受图箒，说明他们对道教的重视。此后的孝文帝则没有这样的活动。但是在洛阳还是兴建了道观。就在献文帝至道坛受图箒的这一年，冯太后又在北魏首都平城修建了永宁寺。

后来，冯太后鸩杀献文帝，临朝称制，在平城永宁寺设大法供，度良家男女为僧尼者百有余人，孝文帝才十岁，就施以僧服，剃发修道，并诏起建明等寺。《魏书·释老志》载，太和初年，仅平城内的寺庙，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孝文帝太和末年到孝明帝正光年间，全国寺庙三万余所，增加五倍，僧尼大众二百余万，增加近三十倍。仅洛阳一地，“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天平元年迁都邺城，洛阳余寺四百二十一所。”^[8]这种变化的契机始于北魏孝文帝之子宣武帝元恪永平年间。永平二年(509)十一月，宣武帝于式乾殿为诸僧、朝臣讲《维摩诘经》。尽管裴延俊作《上宣武帝疏谏专心释典不事坟籍》进行劝阻，但是已经不能阻挡佛教的大盛。

这一年，宣武帝修建了皇家寺庙永明寺，五年以后，孝明帝熙平元年(516)，灵太后胡氏又修建了最著名的永宁寺。其修建时间晚于平城永宁寺五十年，其规模却远远超越平城的同名寺庙。《洛阳伽蓝记》卷一和释道宣《续高僧传》卷一《菩提流支传》有极为详尽的描写：

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上有金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初掘基至黄泉下，得金像三十躯，太后以为信法之征，是以营建过度也。刹上有金宝瓶，容二十五斛。宝瓶下有承露金盘一十一重，周匝皆垂金铎。复有铁锁四道，引刹向浮图四角，锁上亦有金铎。铎大小如一石瓮子。浮图有九级，角角皆悬金

铎，合上下有一百三十铎。浮图有四面，面有三户六窗，户皆朱漆。扉上各有五行金铃，合有五千四百枚。复有金环铺首，殫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议。绣柱金铺，骇人心目。至于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浮图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极殿。中有丈八金像一躯，中长金像十躯，绣珠像三躯，金织成像五躯，玉像二躯。作工奇巧，冠于当世。僧房楼观，一千余间，雕梁粉壁，青璩绮疏，难得而言。栝柏椿松，扶疏檐雷。丛竹香草，布护阶墀。

“銜之尝与河南尹胡孝世共登之，下临云雨，信哉不虚！”^[9]

从这样的描写看，作者对于洛阳永宁寺不无敬仰之意。然而，就是这样一座宏伟的建筑，二十年后的永熙三年(534)二月，还是毁于大火。大火从第八级中平旦大发，当时“雷雨晦冥，杂下霰雪，百姓道俗，咸来观火。悲哀之声，震动京邑。时有三比丘，赴火而死。火经三月不灭。有火入地寻柱，周年犹有烟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曾对该寺进行过考古发掘，在永宁寺遗址发现彩色泥塑等，甚至还能看到当年焚烧后留下的焦土。

不仅如此，三年之后的元象元年(538)，东魏将领高昂、侯景焚毁了洛阳。曾风华无限的洛阳城，化作落日黄昏。杨銜之在《洛阳伽蓝记》自序中说，他在武定五年(547)因行役重游洛阳，见“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牧竖，踟躕于九逵；农夫耕老，艺黍于双阙。始知《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10]作者将这场大火与“京师迁邺”联系起来，“始知《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显然，《洛阳伽蓝记》的写作，寄托着作者的历史兴衰之感，反映着作者对于佛教文化的复杂心态。

洛阳城虽然富庶，佛教昌盛，然而留在北土的鲜卑族却备极困苦，且目睹洛阳状况，益以张

彝之死,已见朝廷之无以,愤而起兵。武泰元年(528),六镇军人尔朱荣乘灭杜洛周之势,举兵南下,进入洛阳,立魏长乐王子攸为帝,是为敬宗孝庄皇帝。尔朱荣又沉胡太后及幼帝于河,大杀公卿,史称“河阴之乱”。永安三年(530),九月,孝庄帝杀尔朱荣。十二月,尔朱兆入洛阳,囚杀孝庄帝于永宁寺。此后,高欢击败尔朱氏,北魏政权控制在高欢手中,又与孝武帝元修争权,元修被迫逃亡关中,北魏分裂。这一年,为永熙三年(534)七月。

其实,北魏灭亡,在这年的二月,就有了一个重要的征兆,那就是永宁寺被大火所烧。可以说,永宁寺已经成为北魏历史兴亡的见证。

四、《洛阳伽蓝记》中的北方学术与文学意蕴

《洛阳伽蓝记》记载佛寺事迹,弥漫着浓郁的宗教情节,固不用说。在《洛阳伽蓝记》中,还有很多学术文化的记载,可以和《魏书》及相关史料相互引证。《太平御览》引《三国典略》:“齐魏收尝在议曹与诸博士引据《汉书》,论宗庙事,博士笑之。收编忿,取《韦玄成传》抵之而起。博士夜共披寻,迟明乃来谢曰:不谓玄成如此学也。”《颜氏家训·勉学》:“俗间儒士,不涉群书,经纬之外,义疏而已。吾初入邺,与博陵崔文彦交游,尝说《王粲集》中难郑玄《尚书》事。崔转为诸儒道之,始将发口,悬见排蹙,云:文集只有诗赋铭诔,岂当论经书事乎?且先儒之中,未闻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魏收之在议曹,与诸博士议宗庙事,引据《汉书》,博士笑曰:未闻《汉书》得证经术。收便忿怒,都不复言,取《韦玄成传》,掷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寻之,达明,乃来谢曰:不谓玄成如此学也。”李同轨亦不辨魏史,如《洛阳伽蓝记》卷一“景林寺”条记载:“永安中,庄帝马射于华林园,百官皆来读碑,疑苗字误。国子博士李同轨曰:‘魏明英才,世称三祖。公幹仲宣,为其羽翼。但未知本意如何,不得言误也。’衔之时为奉朝请,因即释曰:‘蒿覆之,故言苗茨。何误之有?’众咸

称善,以为得其旨归。”按:魏明帝时,王粲、刘楨早已亡故,何来明帝羽翼?

尤其是当时无行文人,没有文德。《洛阳伽蓝记》多有记载,如卷一“魏昌尼寺”条说当时文人构造碑文:“生时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穷天地之大德,尽生民之能事,为君共尧舜连衡,为臣与伊皋等迹。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尘;执法之吏,埋轮谢其梗直。所谓生为盗跖,死为夷齐,妄言伤正,华辞损实。”他以苻坚为例,称“苻坚自是贤主”,“虽好勇嗜酒,亦仁而不杀。观其治典,未为凶暴。及详其史,天下之恶皆归焉。苻坚自是贤主,贼君取位,妄书君恶,凡诸史官,皆是类也。人皆贵远贱近,以为信然。当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

从文学描写的角度看,北方文学绝大多数还处在质朴的状态,但也有一些文字如祖莹代北海王元颢致孝庄帝的信,骈散相兼,雅俗共赏:

大道既隐,天下匪公。祸福不追,与能义绝。朕犹庶几五帝,无取六军。正以糠粃万乘,锱铢大宝,非贪皇帝之尊,岂图六合之富?直以尔朱荣往岁入洛,顺而勤王,终为魏贼。逆刃加于君亲,锋镝肆于卿宰。元氏少长,殆欲无遗。已有陈恒盗齐之心,非无六卿分晋之计。但以四海横流,欲篡未可;暂树君臣,假相拜置。害卿兄弟,独夫介立。遵养待时,臣节詎久?朕睹此心寒,远投江表,泣请梁朝,誓在复耻。风行建业,电赴三川,正欲问罪于尔朱,出卿于桎梏;恤深怨于骨肉,解苍生于倒悬。谓卿明眸击节,躬来见我,共叙哀辛,同讨凶羯。不意驾入城皋,便尔北渡。虽迫于凶手,势不自由;或貳生素怀,弃剑猜我。闻之永叹,抚衿而失。何者?朕之于卿,兄弟非远。连枝分叶,兴灭相依。假有内阏,外犹御侮;况我与卿,睦厚偏笃,其于急难,凡今莫如。弃亲即仇,义将焉据也?且尔朱荣不臣之迹,暴于旁午,谋魏社稷,愚智同见。卿乃明白疑于必然,托命豺狼,委身虎口,弃亲助贼,兄弟寻戈。假获民地,本是荣物;若克城

邑，绝非卿有。徒危宗国，以广寇仇。快贼莽之心，假卞庄之利。有识之士，咸为惭之。今家国隆替，在卿与我。若天道助顺，誓兹义举，则皇魏宗社，与运无穷。悦天不厌乱，胡羯未殄，鸱鸣狼噬，荐食河北，在荣为福，于卿为祸。岂伊异人？尺书道意，卿宜三复。义利是图，富贵可保，狗人非虑。终不食言，自相鱼肉。善择元吉，勿贻后悔。

又如卷一“景乐寺”条描写音乐杂技艺术：“至于大斋，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管寥亮，谐妙入神。”此外还有魔术杂技之类：“召诸音乐，逞伎寺内。奇禽怪兽，舞扑殿庭。飞空幻惑，世所未睹。异端奇术，总萃其中。剥驴投井，植枣种瓜，须臾之间，皆得食之。士女观者，目乱精迷。自建义已后，京师频有大兵，此戏遂隐也。”^[11]前引卷四“法云寺”条提到“快马健儿，不如老嫗吹篴”形容婢女朝云技艺之高。快马健儿，又见《旧唐书·音乐志二》：“篴，吹孔有觜如酸枣。横笛，小篴也。汉灵帝好胡笛，五胡乱华，石遵玩之不绝音。宋书云：有胡篴出于胡吹，则谓此。梁胡吹歌云：‘快马不须鞭，反插杨柳枝。下马吹横笛，愁杀路傍儿。’此歌辞元出北国。之横笛皆去觜，其加觜者谓之觜笛。”

卷三“高阳王寺”条：“美人徐月华，善弹箜篌，能为明妃出塞之歌，闻者莫不动容。永安中，与卫将军原士康为侧室，宅近青阳门。徐鼓箜篌而歌，哀声入云，行路听者，俄而成市。徐常语士康曰：‘王有二美姬，一名修容，二名艳姿，并蛾眉皓齿，洁貌倾城。修容亦能为绿水歌，艳姿善为火凤舞，并爱倾后室，宠冠诸姬。’士康闻此，遂常令徐鼓绿水、火凤之曲焉。”徐月华的箜篌，可以使“行路听者，俄而成市”，这就有点像《陌上桑》的情调。

《洛阳伽蓝记》记载了近百所寺庙楼台，诚如序言所说，“招提栴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讲殿共阿房等壮。”就其一般情形说，各个寺庙之间，周围环境不同，大小不同，但是相同处更多，如何表现这

些寺庙的不同呢？这就需要各种语言的功夫，譬如形容金刚华丽“鸠鸽不入，鸟雀不栖”；形容宫殿高墙“绮柱珠帘”“朱柱素壁”“雕墙峻宇”“雕梁粉壁”；形容鸟声“春鸟秋蝉，鸣声相续”；形容林木“枝条横绕，柯叶傍布，形如羽盖”“楸槐荫途，桐杨夹植”“竹松兰芷，垂列阶墀，含风团露，流香吐馥”；形容池水“水犹澄清，洞底明静”“荷出池，绿萍浮水，飞梁跨阁，高树出云”；等等。

当然，也有词穷的时候。如“扶疏”一词就三四见。为解决这个问题，作者会采用比较的方法。《洛阳伽蓝记》开篇就用了浓墨重彩描写了永宁寺的雄伟绚丽。这是寺庙的最高标准。卷三“景明寺”条，“庄饰华丽，侔于永宁。金盘宝铎，灿烂霞表。”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引用当时的谚语，或者文人的描述。如描绘鱼市“鱼味甚美。京师语曰：‘洛鲤伊鲂，贵于牛羊’”。如卷二“正始寺”条“高林巨树，足使日月蔽亏；悬葛垂萝，能令风烟出入。崎岖石路，似壅而通；崢嶸涧道，盘纡复直。是以山情野兴之士，游以忘归”。于是引出姜质的《庭山赋》，皆如此。又如卷三“景明寺”条记载该寺为七层浮图一所，去地百仞。然后引用邢劭的碑文来形容：“俯闻激电，旁属奔星”，就首见于此。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七星在北户”等就源于此。卷三引“龙华寺”条常景的《纳颂》，也是这样的作用。

文学的描写也很夸张，如卷三描绘永桥以南白象、狮子二坊，其中有波斯所献雄狮，作者这样描写：

庄帝谓侍中李彧曰：“朕闻虎见狮子必伏，可觅试之。”于是诏近山郡县捕虎以送。巩县、山阳并送二虎一豹。帝在华林园观之。于是虎豹见狮子，悉皆瞑目，不敢仰视。园中素有一盲熊，性甚驯，帝令取试之。虞人牵盲熊至，闻狮子气，惊怖跳踉，曳锁而走。

还有的时候，通过历史的故事，抨击世间人情之薄。如“秦太上君寺”条解释“怀砖”之意：

太傅李延寔者，庄帝舅也。永安年中除青州刺史，临去奉辞。帝谓寔曰：“怀砖之

俗，世号难治；舅宜好用心，副朝廷所委。”寔答曰：“臣年迫桑榆，气同朝露，人间稍远，日近松丘。臣已久乞闲退，陛下渭阳兴念，宠及老臣，使夜行罪人，裁锦万里，谨奉明敕，不敢失坠。”时黄门侍郎杨寔在帝侧，不晓怀砖之义，私问舍人温子升。子升曰：“吾闻至尊兄彭城王作青州刺史，问其宾客从至青州者云：齐土之民，风俗浅薄，虚论高谈，专在荣利。太守初欲入境，皆怀砖叩首，以美其意。及其代下还家，以砖击之。言其向背速于反掌。是以京师谣语云：狱中无系囚，舍内无青州，假令家道恶，腹中不怀愁。怀砖之义起在于此也。”

李延寔辞去青州刺史官位时说的一段话很有文学色彩：“臣年迫桑榆，气同朝露，人间稍远，日近松丘。臣已久乞闲退，陛下渭阳兴念，宠及老臣，使夜行罪人，裁锦万里，谨奉明敕，不敢失坠。”文字极其优美。下文有转引崔叔仁称齐士大夫，曰：“齐人外矫仁义，内怀鄙吝；轻同羽毛，利等锥刀。好驰虚誉，阿附成名，威势所在，侧肩竞入，求其荣利，甜然浓泗。譬于四方，慕势最甚。”故时人皆号齐地士子为慕势诸郎。

北魏孝明帝元诰孝昌元年(525)六月，魏军逼彭城，梁武帝子萧综出降，封高平郡公、丹阳王，更名赞。然而南人到北方，多有不得志处，故创作了《听钟鸣》《悲落叶》等诗。《梁书》本传和《洛阳伽蓝记》都记载了这个文学故事，所引诗歌多有差异。如《梁书》文本：

听钟鸣，当知在帝城。参差定难数，历乱百愁生。去声悬窈窕，来响急徘徊。谁怜传漏子，辛苦建章台。

听钟鸣，听听非一所。怀瑾握瑜空掷去，攀松折桂谁相许。昔朋旧爱各东西，譬如落叶不更齐。漂漂孤雁何所栖，依依别鹤夜半啼。

听钟鸣，听此何穷极。二十有余年，淹留在京域。窥明镜，罢容色，云悲海徒徒揜抑。

其《悲落叶》云：

悲落叶，连翩下重迭。落且飞，从横去不归。悲落叶，落叶悲，人生譬如此，零落不可持。

悲落叶，落叶何时还？夙昔共根本，无复一相关。

当时见者莫不悲之。按：《艺文类聚》三十所载文字不同：

历历听钟鸣，当知在帝城。西树隐落月，东窗见晓星。雾露眇眇未分明，乌啼哑哑已流声。惊客思，动客情，客思郁纵横。翩翩孤雁何所栖，依依别鹤半夜啼。今岁行已暮，雨雪向凄凄。飞蓬旦夕起，杨柳尚翻低。气郁结，涕滂沱。愁思无所托，强作听钟歌。

《文苑英华》三百三十四：

听钟鸣，当知在帝城。西树隐落月，东窗见晓星。雾露眇眇未分明，乌啼哑哑已流声。惊客思，动客情，客思郁纵横。翩翩孤雁何所栖，依依别鹤半夜啼。今岁行已暮，雨雪向凄凄。飞蓬旦夕起，杨柳尚翻低。气郁结，涕滂沱。乡思无所托，强作听钟歌。

《艺文类聚》八十八所载《悲落叶》：

悲落叶，联翩下重叠。重叠落且飞，从横去不归。长枝交荫昔何密，黄鸟关关动相失。夕蕊杂凝露，朝花翻乱日。乱春日，起春风，春风春日此时同。一霜两霜犹可当，五晨六旦飒已黄。乍逐惊风举，高下任飘飏。悲落叶，落叶何时还？夙昔共根本，无复一相关。各随灰土去，高枝难重攀。

杨勇《洛阳伽蓝记校笺》谓“《魏书》本传歌辞则稍有不同”，不知何据。《艺文类聚》《文苑英华》并未注明出自《魏书》，今存魏收《魏书》亦未记载。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详引《梁书》《魏书》，未说出自《魏书》。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仅据《艺文类聚》《文苑英华》过录，未载《梁书》，当补上。

六十年前，北魏献文帝拓跋弘和平六年(465)刘宋征北大将军、义阳王刘昶据徐州抗命，兵败，叛奔北降魏。北魏献文帝作《下书纳义阳王昶》，封为丹阳王。刘昶作《断句诗》：

白云满鄣来，黄尘暗天起。关山四面绝，故乡几千里。

可见,他们离开故土,其实还有很多不舍和眷念。

《洛阳伽蓝记》卷三“正觉寺”条称:“劝学里东有延贤里,里内有正觉寺,尚书令王肃所立也。”下面引出王肃修建这座寺庙的由来。原来,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太和十七年(齐武帝萧毓永明十一年493),王肃的父亲王奂为齐武帝所杀,王肃只身投奔北魏。那年他三十岁。初入北魏,尚书令王肃曾于省中咏《悲平城》(《魏书·祖莹传》)诗云:

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

彭城王勰甚嗟其美,但口误将《悲平城》说成了《悲彭城》。王肃带有挑衅的口吻让元勰应和,元勰一时口拙,祖莹当即应声而咏《悲彭城》:

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尸积石梁亭,血流睢水里。

元勰说,“今日若不得卿,几为吴子所屈。”这已不是应和问题,带有南北文人争胜之意。元勰当然也咽不下这口气。《魏书·元勰传》载,后随孝文帝去平城,次于铜鞮山,路旁有大松树十数根。孝文帝赋诗,令元勰和之,元勰作《问松树》,用的就是王肃《悲平城》句式,终报一诗之辱:

问松林,松林经几冬?山川何如昔,风云与古同。

《洛阳伽蓝记》卷三“正觉寺”条还记载:

肃初入国,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京师士子道肃一饮一斗,号为漏卮。经数年已后,肃与高祖殿会,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谓肃曰:“卿中国之味也,羊肉何如鱼羹?茗饮何如酪浆?”肃对曰:“羊者是陆产之最,鱼者乃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以味言之,甚是优劣。羊比齐鲁大邦,鱼比邾莒小国,唯茗不中,与酪作奴。”高祖大笑。因举酒曰:“三三横,两两纵,谁能辨之,赐金钟。”御史中尉李彪曰:“沽酒老姬瓮注瓠,屠儿割肉与秤同。”尚书左丞甄琛曰:“吴人浮水自云工,妓儿掷绳在

虚空。”彭城王勰曰:“臣始解此字是习字。”高祖即以金钟赐彪。朝廷服彪聪明有智,甄琛和之亦速。彭城王谓肃曰:“卿不重齐鲁大邦,而爱邾莒小国。”肃对曰:“乡曲所美,不得不好。”彭城王重谓曰:“卿明日顾我,为卿设邾莒之食,亦有酪奴。”因此复号茗饮为酪奴。

当时,为了政治的需要,北魏对于四方投奔者,给予厚待,多居不次之位。《洛阳伽蓝记》卷三“龙华寺”条记载洛阳有四夷馆(金陵、燕然、扶桑、崦嵫)和四夷里(归正、归德、慕化、慕义)。吴人来附者先处金陵馆,三年后赐宅归正里。北人来附者先处燕然馆,也是三年赐宅归德里。东方来附者先处扶桑馆,后赐宅慕化里。西方来附者先处崦嵫馆,后赐宅慕义里。当时,“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闾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柳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然而,这种安排久而久之,也会形成一种偏见,把这些地方视为投诚人聚集之处。卷三“高阳王寺”条载:

正光初,广宗潘崇和讲服氏春秋于城东昭义里,子文摄齐北面,就和受道。时赵郡李才问子文曰:“荀生住在何处?”子文对曰:“仆住在中甘里。”才曰:“何为住城南?”城南有四夷馆,才以此讥之。子文对曰:“国阳胜地,卿何怪也?若言川涧,伊洛峥嵘,语其旧事,灵台石经。招提之美,报德、景明。当世富贵,高阳、广平。四方风俗,万国千城。若论人物,有我无卿!”才无以对之。崇和曰:“汝颖之士利如锥,燕赵之士钝如锤。信非虚言也。”举学皆笑焉。

南方投奔者都集中在归正里,民间号为吴人坊。这里靠近伊洛二水,有三千余家,自立巷市。所卖口味,多是水产品,时人谓为鱼鳖市。“伊洛之鱼,多于此卖,士庶须臾,皆诣取之。鱼味甚美。京师语曰:‘洛鲤伊鲂,贵于牛羊。’”显然,当局

认为吴人居于水乡,对水产有着天然的嗜好。当时,这种安排,有多少带有屈辱的味道。萧宝寅、张景仁就耻“与夷人同列”,求入城内。后来,萧宝寅移居永安里,张景仁徙居孝义里。这里涉及南北风俗的巨大差异,更有南北的敌视。《洛阳伽蓝记》卷二“景宁寺”条:

永安二年萧衍遣主书陈庆之送北海入洛阳僭帝位。庆之为侍中。景仁在南之日与庆之有旧,遂设酒引邀庆之过宅。司农卿萧彪、尚书右丞张嵩并在其坐,彪亦是南人。唯有中大夫杨元慎、给事中大夫王煦是中原士族。庆之因醉谓萧张等曰:“魏朝甚盛,犹曰五胡,正朔相承,当在江左。秦朝玉玺,今在梁朝。”元慎正色曰:“江左假息,僻居一隅,地多湿垫,攢育虫蚁,疆土瘴疠,蛙龟共穴,人鸟同群。短发之君,无杼首之貌;文身之民,稟叢陋之质。浮于三江,棹于五湖,礼乐所不沾,宪章弗能革。虽复秦余汉罪,杂以华音,复闽楚难言,不可改变。虽立君臣,上慢下暴。是以刘劭杀父于前,休龙淫母于后,见逆人伦,禽兽不异。加以山阴请婚卖夫,朋淫于家,不顾讥笑。卿沐其遗风,未沾礼化,所谓阳翟之民不知瘦之为丑。我魏膺篆受图,定鼎嵩洛,五山为镇,四海为家。移风易俗之典,与五帝而并迹,礼乐宪章之盛,凌百王而独高。岂卿鱼鳖之徒,慕义来朝,饮我池水,啄我稻粱,何为不逊,以至于此?”庆之等见元慎清词雅句,纵横奔发,杜口流汗,含声不言。于后数日,庆之遇病,心上急痛,访人解治。元慎自云能解,庆之遂凭元慎。元慎即口含水嚙庆之曰:“吴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制衣裳,自呼阿侬,语则阿傍。菘穉为饭,茗饮作浆,呷啜菹羹,啜嘲蟹黄,手把豆蔻,口嚼槟榔。乍至中土,思忆本乡,急手速去,还尔丹阳。若其寒门之鬼,□头犹脩,网鱼漉鳖,在河之洲,咀嚼菱藕,据拾鸡头,蛙羹蚌臠,以为膳羞。布袍芒履,倒骑水牛。沅湘江汉,鼓棹遨游,随波溯浪,唵唱沈浮。白

纒起舞,扬波发讴。急手速去,还尔扬州。”庆之伏枕曰:“杨君见辱深矣。”自此后,吴儿更不敢解语。北海寻伏诛,其庆之还奔萧衍,衍用其为司州刺史,钦重北人,特异于常。朱异怪复问之。曰:“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如登泰山者卑培塿,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庆之因此羽仪服式悉如魏法,江表士庶竞相模楷,褒衣博带,被及秣陵。元慎语言之犀利,纵横奔发,令陈庆之无以招架。我们读《颜氏家训》,说到南方士大夫“褒衣博带”,侯景之乱时,不堪一击。这种羽仪服式,原来是江表士庶竞相模楷北方的结果。

到了南北朝对峙的中后期,南北士人颇多接触,彼此多有了解,互有影响。王肃初入洛,才三十岁,却有着文化上的优越感。他曾与刘芳讨论礼学,史载,刘芳时年四十一岁,才思深敏,特精经义,博闻强记,兼览苍、雅,尤长音训,辨析无疑。这叫王肃极为钦佩,呼之为“刘石经”。刘芳乃北魏平定河西之后,被迫来到洛阳,可见,北朝中后期的学术文化,来源于多个地方,这就比南方更为多元。

我们再看成淹与王肃在朝歌对话,颇有《世说新语》韵味。《魏书·成淹传》记载,成淹与王肃都曾在南朝做官,孝文帝试图比较二人学术文化的高低。史书是这样记载的:

行到朝歌,肃问此是何城。淹言紂都朝歌城。肃言:“故应有殷之顽民也。”淹言:“昔武王灭紂,悉居河洛,中因刘石乱华,仍随司马东渡。”

肃知淹寓于青州,乃笑而谓淹曰:“青州间何必无其余种。”淹以肃本隶徐州,言:“青州本非其地,徐州间今日重来,非所知也。”肃遂伏马上掩口而笑,顾谓侍御史张思宁曰:“向者聊因戏言,遂致辞溺。”思宁驰马奏闻,高祖大悦,谓彭城王勰曰:“淹此段足为制胜。”

舆驾至洛，肃因侍宴。高祖戏肃曰：“近者行次朝歌，闻成淹共卿殊有往覆，卿试重叙之。”肃言：“臣前朝歌为淹所困，不谓此事仰闻听览。臣尔日失言，一之已甚，岂宜再说。”遂皆大笑。高祖又谓肃曰：“淹能制卿，其才亦不困。”肃言：“淹才词便为难有，圣朝宜应叙进。”高祖言：“若因此进淹，恐辱卿转甚。”肃言：“臣屈已达人，正可显臣之美。”高祖曰：“卿既为人所屈，欲求屈己之名，复于卿太优。”肃言：“淹既蒙进，臣得屈己伸人，此所谓陛下惠而不费。”遂酣笑而止。

你来我往，在口才上，在学识上，争强斗胜。王肃自然得到孝文帝的器重。更何况刚刚迁都洛阳，正需要在文化上的支持。所以他将自己的妹妹陈留公主嫁给王肃。

王肃在江南娶谢庄女为妻，后来，谢氏携二女及子王绍到王肃任职的寿春，才知道王肃已另娶陈留公主，悲伤不已。《洛阳伽蓝记》卷三“正觉寺”记载了谢氏给王肃写的诗：

本为箔上蚕，今作机上丝。得路逐胜去，
颇忆缠绵时。

陈留公主代肃答谢云：

针是贯线物，目中恒任丝。得帛缝新去，
何能纳故时。

可见当时北魏汉化程度较深，孝文帝的妹妹也可以写得一手好诗。^[12]“肃甚愧谢之色，遂造正觉寺以憩之。肃忆父非理受祸，常有子胥报楚之意，卑身素服，不听音乐，时人以此称之。”由此看出，王肃对于旧情始终没有忘怀。这里有桑梓之情，也有南北风尚之异。

王肃卒于北魏宣武帝元恪景明二年(501)寿春任上，时年三十八岁。他至死也没有回到江南。宣武帝作《遣赙王肃诏》《令王肃葬京陵诏》，获得极高的死后殊荣。史书又载“绍袭。绍，字三归。历官太子洗马、员外常侍、中书侍郎。卒，赠辅国将军、徐州刺史。”《汉魏晋南北

朝墓志汇编》收录了王肃之子王绍、其女王普贤的两方墓志，所述与《魏书·王肃传》的记载基本吻合。但是文字比较枯淡，没有《洛阳伽蓝记》那样摇曳多姿的文字。王肃卒时，谢氏携子女自洛阳前往寿春奔丧，留下一段永久的伤痛。

注释：

[1]范祥雍：《杨銜之传略》，《〈洛阳伽蓝记〉校注》附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王建国：《〈洛阳伽蓝记〉的作者及创作年代辨证》（《江汉论坛》2009年第10期），亦主张姓“杨”而非“阳”或“羊”。

[2]周延年：《杨銜之事实考》，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附），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

[3]“杨銜之的祖籍为平州其可能性当大于定州，把他说成遵化附近人似比说成今保定或定州市人为妥。”见曹道衡：《关于杨銜之和〈洛阳伽蓝记〉的几个问题》，《文学遗产》2001年第3期。

[4]参见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杨銜之”一节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

[5]东魏武定四年至武定八年(546—550)魏齐禅代，东魏秘书监相继由徐之才和魏收担任，《广弘明集》说銜之“元魏末为秘书监”依据不足，见李煜东：《杨銜之“元魏末为秘书监”再献疑》，《江海学刊》2022年第2期。

[6]周祖谟在《洛阳伽蓝记校释·叙例》说，吴若准是“本顾氏之说”而区分正文、注文。吴若准在书序里似只提到刘知几，没有提到顾千里，但顾千里的生卒年确实比吴若准早不少，顾、吴之间也许存在某种连接。

[7]吴晶：《〈洛阳伽蓝记〉体例质疑》（《文学遗产》2009年第5期）认为“合本子注”主要在卷五涉及惠生的内容。王建国：《隋唐佛教经籍著录〈洛阳伽蓝记〉的文献价值》（《中国典籍与文化》2014年第2期）主张整体都是正文、子注分开。

[8]相关论述可参见贺玉萍：《北魏洛阳石窟文化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

[9][10][11][北魏]杨銜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2、52页。

[12]《颜氏家训·治家》：“江东妇女，略无交游，其婚姻之家，或十数年间，未相识者，惟以信命赠遗，致殷勤焉。邨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见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60页。陈留公主代王肃写诗，可为一证。

【责任编辑：李本红】